

鼓吹历史名人

沈阳出版社

铁岭市副市长 梁文萱

铁岭历史悠久。几千年来，各族人民在这片美丽而神奇的土地上繁衍生息，源远流长。古往今来，孕育了许多风流人物，说明铁岭是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地方。《铁岭历史名人》围绕着爱国主义这一主题，按照近现代人物为主，本地人物为主，正面人物为主的原则，编辑了65位历史人物。在这些人物中：有为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英勇献身、受到革命导师列宁嘉奖的“中国红鹰团团长”，有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一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光荣牺牲的革命烈士；有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涌现的英雄模范；还有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家乡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物……。他们的事迹感人至深，可歌可泣。

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全国已经吹响向本世纪末的战略目标胜利进军的号角。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和规划，需要对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我们期待通过学习宣传铁岭历史名人的事迹，在全市激发起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增强热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感情，并将这种感情化作无穷无尽的力量，融汇到各行各业的工作中去，贯串到每个人的行动中去，进而在全社会形成深厚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使铁岭历史名人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人民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发扬光大，激励全市人民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阔步前进。

《铁岭历史名人》不仅是一部好的人物传，而且还不失为一部形象化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具有较强的可读性。铁岭市地方志办公室和市文化局的同志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才得以使本书在较短的时间内面世。在此，我代表市政府向他们及其他为编纂这本书而辛勤工作的同志表示感谢。

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在党和各级政府领导下开展的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崇高事业，它是社会文化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地情和国情的载体。它首先为当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因此，编好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项光荣的历史使命。希望全市各级政府部门加强领导，并给予一定的条件和支持。同时，广大修志工作者要主动争取领导，勇于实践，辛勤耕耘，为编出具有铁岭地方特点和时代特色的新志书而努力奋斗。

1991年2月13日

目 录

序 言

任辅臣.....	1	张静超.....	91
高崇民.....	6	张前冲.....	94
朱承泽.....	11	齐仲恒.....	99
褚凤岐.....	15	安郁斌.....	101
赵进扬.....	18	戴子强.....	103
高尔华.....	28	刘涌新.....	105
王 铸.....	31	宋复科.....	107
张希尧.....	33	安业民.....	108
杜者薇.....	36	李文华.....	111
张乐然.....	40	李士安.....	113
石 璞.....	45	孙忠杰.....	117
孙西林.....	51	张成仁.....	121
许 芝.....	64	文国忠.....	127
刘卓仁.....	70	金玉廷.....	129
冯基平.....	73	梁冠山.....	131
关俊彦.....	76	栾法章.....	134
马识途.....	79	刘粹刚.....	136
车向忱.....	83	高荫周.....	141
张金辉.....	87	刘尚清.....	144
金运光.....	89	李孀氏.....	146

霍云阁.....	148	任庆泰.....	201
傅颖宾.....	151	郝 浴.....	204
逝波法师.....	157	郑文焯.....	209
曹国襄.....	160	纳兰性德.....	213
杨 儒.....	162	庆 宽.....	215
孙广庭.....	166	赵厚达.....	218
高 鹗.....	173	李眉山.....	220
高其佩.....	178	李成梁.....	223
高其倬.....	181	刘翔阁.....	226
董国祥.....	182	常隆基.....	228
魏燮均.....	184	赵世柱.....	231
于 珍.....	188	何松亭.....	234
张德明.....	193	后 记.....	237

任 辅 臣

任辅臣，字佐卿。1884年4月生，铁岭县镇西堡乡河夹心村人。少年时代因家贫无力读书，随其在外地教书的舅父念了五年私塾后家境好转，进入铁岭县城银冈书院学习。1898年，帝俄在铁岭开始修筑东清铁路支线（哈尔滨经铁岭至大连线），招收雇员，任辅臣应召做录事，在工作中学会俄语。

1901年，任辅臣抱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报考了奉天警员教练所，毕业后分配回铁岭当警官。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任辅臣因会俄语，被俄军强行拉去当通事（翻译）。在做通事过程中，通过和俄国军官的接触，知道俄国有一个“社会民主工党”（联共前身），是为被压迫阶级办事的党。当时的俄国军官中有不少是这个团体的成员。后来他又结识了具有革命思想的军官，从此，他开始接触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1907年他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放弃了新民警察署副警事长的职务，只身去哈尔滨，通过当通事时结识的俄国军官的介绍，在东清铁路护路军司令部主办的俄国军官学堂任汉语教官。这时他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参加了联共（布）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滨工人团”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活动。1908年，他秘密地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

1909年夏，东清路帝俄当局逮捕了几名在军官学堂工作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后，很快觉察到任辅臣的革命活动，但因他与哈尔滨中国当局的上层人物有一定联系，不好正面对他采取行动，就暗中买通了中国土匪，趁他与妻兄洗澡之机，在浴池门口向他开了黑枪。他胸部中弹，右手掌被射穿，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

他还用左手握枪还击，土匪被迫逃跑。任辅臣被暗害未死，俄国反动当局并不甘心，又企图趁他住院养伤的时候加以迫害。在此紧急关头，任妻张含光想方设法加以营救，任化装出了医院，在党（布）组织的帮助下，连夜去齐齐哈尔。到齐齐哈尔不久，在党（布）组织的指派下，去黑龙江省警察总署任巡逻队长，其主要任务是带领巡逻队员，巡查黑龙江沿岸及外蒙边界。党组织（布）给他的任务是掩护被沙俄流放到东西伯利亚地区的政治犯，潜渡黑龙江越境避难。

1912年，沙俄当局发现一个布尔什维克的重要流放犯，越过黑龙江被任辅臣掩护起来，因而向当时黑龙江省都督宋小濂发出通牒，限中国行政当局交出越境人犯，并引渡任辅臣，否则就要在48小时后向黑龙江南岸中国一方开炮。宋小濂当即秘密把任辅臣逮捕入狱。由于查不出他藏匿人犯的确实证据，加上宋小濂平时对任辅臣的器重和同学、同事的多方营救，宋小濂明着对任辅臣下通缉令，暗中却把他秘密送出了齐齐哈尔。后在绥芬河的东宁县任水上警察局局长。他在任职期间除了继续转运、掩护布尔什维克政治流放犯外，还经常过河到俄国一方去开会。1913年离开东宁县回哈尔滨，经人介绍任税务局局长。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参加了协约国，按协约国的协定，中国应派华工到各协约国去当劳工，仅去沙皇俄国的华工就达10万多人。1914年末在哈尔滨由富亚公司招募了2000多华工到俄国去劳动。任辅臣受布尔什维克党的指派，以外交署官员的身份到俄国乌拉尔地区的彼尔姆省阿拉巴耶夫斯克矿区，从事开矿、采伐木材等艰苦劳动。一年后，其妻张含光带3个未成年的孩子也去了俄国。

华工们在俄国每日从事繁重的劳动，却不得温饱，不少人生了病，加上劳动条件极为原始，又无任何劳动保护措施，伤亡事

故时有发生。任辅臣为改变华工的悲惨境况而积极奔走，和俄国有关当局力争改善华工们的生活、生产条件。这样他得到华工们的高度信任和爱戴。随着他在华工中的威信日益提高，开始在华工中建立革命组织，宣传革命道理，把革命传单译成中文，散发到华工中去，提高华工们的思想觉悟。1916年，由于俄国矿场主、伐木场主无故扣发华工们的工钱，任辅臣暗中组织了罢工活动。场主发觉罢工和任辅臣有关，便告发到彼尔姆省反动当局，当地警察局以“组织暴乱”的罪名，把他软禁起来，但警方并没有查出更多的证据，加上党组织的营救和彼尔姆省一些较有地位的华侨联保，很快解除了他的软禁。任辅臣组织这次罢工后，使华工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一些改善，更主要的是加强了华工间的团结，坚定同场主斗争的意志，为迎接革命风暴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在列宁同志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发动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当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阿拉巴耶夫斯克矿区时，华工们奔走相告，一片欢腾。任辅臣也激动万分，盼望已久的革命风暴终于到来了。在他的倡议和组织下，全矿区1500多名华工参加了红军，组建了一个“中国团”，任辅臣被任命为团长，中国团的成立影响很大，受到苏维埃政府的热烈欢迎和重视。被编入红军第三军第二十九阻击师，并给中国团派来一位俄国同志任政委，中国团成立后，这些受苦的华工，经过短期的训练便换上了红军服装，不久就开赴前线作战。

1917年底，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正处于最艰苦的时期，东战区的形势尤为险恶，高尔察克白匪军在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活动更为猖獗。为了捍卫阿拉巴耶夫斯克矿区，中国团首次与白匪交战，这是在阿拉巴耶夫斯克附近一个白匪占据的村镇上展开的。中国团趁夜出袭，攻其不备，一举全歼了该地的白匪军。中

国团首战告捷，军威大振。后来接着又打了几个胜仗。尽管如此，东部战场总的形势仍然十分险恶，白匪军的气焰嚣张，步步紧逼，战线逐渐西移。从1918年春季开始，中国团转战在都拉河、卡马河地带。中国团在团长任辅臣的指挥下，在阿拉塔伊河附近打败了人数占优势的敌人，并且把敌人击退在上都拉。对中国团的旺盛士气和卓越的战绩，当时的《共产主义者》报这样报道：

“中国部队是我们战线上最坚强的部队……中国团之所以有这样顽强的战斗力，在于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无限忠诚，在于官兵间有着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阶级感情。”

任辅臣很重视从思想上武装战士，部队在后方休整期间，他白天给战士们讲革命道理，晚上组织干部学习共产主义理论，他把自己的一切完全交给了部队。

1918年10月，中国团向气焰嚣张的高尔察克白匪帮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一天拂晓，中国团的骑兵健儿率先挥着马刀冲进白匪占据的拉亚镇，步兵也紧随而至，把装备优良、数倍于中国团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这次战役，战绩辉煌，打死打伤敌人数百人，俘300多人。这次战役后，苏维埃中央于10月27日命名中国团为“红鹰团”。在庫什瓦城举行了隆重的授旗仪式。授旗后，部队转战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一带，接连又打了几个硬仗。此间，一座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铁路桥梁落到白匪手里，形势对红军十分不利。红军司令部给中国团下令，要求在短时间内把桥梁夺回来。中国团接到命令后，立即赶到指定地点。当部队逼近桥梁时，发现敌人在桥的另一端架设两挺重机枪，组成了严密的火力网，封锁了桥面，使战士抬不起头来，他们每向前进一步，都得付出极大的代价。两次进攻都未成功，战士伤亡很大。在这紧急关头，任辅臣命令第二营长桑来朝重新组织火力，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桑来朝营长一心要为牺牲的战友复仇，他一马当先，

率领部分战士冲过桥去，冲入敌人阵地，与敌人机枪手肉搏起来。敌人的机枪哑了，大批战士冲过桥去，歼灭了守桥的白匪军，夺回了桥梁。桑营长身中数弹，壮烈牺牲。中国红鹰团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受到了嘉奖。11月下旬任辅臣被任命为该战场的临时总指挥。在维亚，他们与白匪军激战一整天，入夜后，部队住宿在军用列车上。附近一个对中国团充满仇恨的富农，连夜跑去向白匪告密。白匪帮趁黑夜突袭维亚，包围了列车，用机枪对列车进行扫射。战士们在任辅臣的指挥下，沉着应战。由于战斗条件对红鹰团十分不利，伤亡惨重。就在这次战斗中，任辅臣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34岁。

任辅臣牺牲后，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高度评价了他的功绩。1918年12月28日《公社社员报》转载了苏维埃政府为任辅臣的牺牲发出的俄文讣告，译文是：“在维亚战役结束时，中国团团长任辅臣同志壮烈牺牲了。任辅臣同志在中国侨民中享有很高威信，他把在中国人中间的影响和威信全部献给了苏维埃俄国。由他组织和领导的中国团部队是我们战线上最坚强的最可信赖的部队。做为世界革命的忠诚战士，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伟大的事业。他的精力，并没有白费，革命战士们将永远记着为全世界被压迫者的事业而献出了生命的中国人民的儿子——任辅臣同志。”

任辅臣牺牲后，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同志在莫斯科召见了他的夫人张含光及二女一子。列宁同志在谈到任辅臣英勇作战时，称赞他是一个卓越的指挥员，是一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并高度评价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

高 崇 民

高崇民，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曾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是全国政协和民盟中央的杰出领导人。原名恩浚，字建国，号崇民，后以号行。1891年11月14日出生于辽宁省开原县靠山满族乡靠山屯村，后迁居开原县大寨子乡。他的一生，光明磊落，浩然正气；他的一生，与中国近代史中许多重大事件紧密相关，是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生前称赞他为“东北人民的师表”。

高崇民幼年聪慧，机敏过人，随父就读于私塾，品学兼优。1909年（清宣统元年）赴奉天（今沈阳）求学，以优异成绩考入奉天省立农林学堂。

1911年，具有强烈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高崇民在奉天秘密加入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组织的中国同盟会，为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进行秘密工作，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1914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省立农林学堂。为了寻求救国之道，高崇民又考取了开原县公费留学生，东渡日本在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其间参加了倒袁运动。1919年学成回国，从事短暂的教育工作。

1923年，他积极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续租旅大的活动，被军阀驱逐出奉天省境。1924年，高崇民在哈尔滨加入了国民党。此时，高崇民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革命者。

1927年，高崇民因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哈尔滨市政

当局发生矛盾，被指控为共产党而遭拘捕，后经进步人士多方营救，加之查无实据，被押回奉天原籍。1929年，高崇民曾一度担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的秘书。

1931年9月18日，张学良在蒋介石不抵抗的指令下，率东北军撤入关内，从而使日本帝国主义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东三省。对此，高崇民愤慨万端，于9月24日入关，到北平责问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张回答，“中央有命令，不让东北事件扩大，一切听从政府。”高崇民对蒋介石卖国罪行，义愤填膺，决心不做官，不经商，一心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张学良为之感动，决定每月给高崇民300元生活费，支持他的抗日救亡活动。9月27日，高崇民与先后到北平的东北著名人士阎宝航、杜重远、车向忱、卢广绩、陈先舟、王化一、王卓然等，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同时筹化组建东北义勇军。

1935年春，高崇民赴武汉徐家棚，向张学良痛陈己见，坚决主张东北军不打内战，应与共产党联合抗日。高崇民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是借刀杀人，目的是让东北军与红军在内战中，双方消耗殆尽。

1935年6月，“四维会”在武汉开座谈会，高崇民发言说：“蒋若不抗日，东北人就不拥护他当领袖。”因此，高崇民与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的贺衷寒进行了激烈地争吵，之后，拂袖退场，为此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通缉。在这之后，高崇民潜居上海租界内。在上海，他通过杜重远结识了共产党员孙达生，并与孙达生结成望年之交。在孙达生的影响下，高崇民学习了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革命理论，开始了思想上的转变，认识到三民主义不可能救中国。他毅然地销毁了自己的国民党党证，决心跟共产党走。从此，高崇民同志，把自己的一生同共产党、共产主义事业紧密地连在了一起。

1935年6月下旬，蒋介石命令张学良赴陕北“剿共”（当时红军主力已长征到陕北），高崇民和杜重远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孙达生同志，孙达生即向上海党的组织汇报。经党中央研究，认为东北军张学良符合党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实行民主、抗日三个条件下的联合对象，应争取与其联合，建立反蒋抗日联合统一战线。东北军、西北军、红军如能联合建立反蒋抗日大西北根据地，则不仅能解除党中央和红军之围，还可以联合苏联、外蒙便于我军进军华北抗日，这将是拯救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的一大转机。当此千钧一发之际，高崇民不顾个人安危，冒着被通缉的危险，接受党组织提出的与孙达生到西北去的建议。杜重远对此表示赞同，并写信让高崇民与西北军的杨虎城、杜承斌联系。

1935年10月，高崇民与孙达生同志商议，决定分别去西安。这也是高崇民同志第一次接受党交给他的关系重大的使命。10月下旬，高崇民路经南京，特向阎宝航说明去西北从事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联合抗日的计划。阎宝航深知蒋介石放弃东北、卖国求荣，又在华北对日退让，剿杀红军、镇压全国人民抗日的内幕，欣然赞同三军联合的计划。并与高崇民同返上海，与杜重远协商。协商后，三人联名给张学良写信。随后，高崇民又密访了天津、北平的地下党领导人王樟木等人，研究赴西安后开展工作的方法，并由胡至一陪同前往西安。

1935年11月，高崇民到西安，会晤了杨虎城将军，转交了杜重远的信，并介绍了杜重远在狱中的情况。两人谈话投机，相见恨晚。随后，高崇民在东北军中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

张学良从南京返回西安后，得知高崇民因与贺衷寒闹翻被通缉，就单独会见了。高崇民先把他和杜重远、阎宝航写的建议书交给张学良，并直言：“蒋介石让东北军剿共的阴谋，意在两

败俱伤，伤在哪一边都是蒋介石的胜利。而共产党、红军是要建立苏联那样新型的国家，穷苦人是真心拥护的，因而是剿不垮的。况且，现在红军北上抗日，真心挽救国家民族危亡，东北军要收复失地，只有与红军和西北军联合，否则没有前途”。张学良听了高崇民的一席话，非常高兴，并委托高崇民再次赴新城大楼与杨虎城会晤，并言明东北军绝无占领西北的想法。高崇民到新城大楼后，向杨虎城转达了张学良深谋远虑的意图：揭露蒋介石妄图制造东北军和西北军之间的矛盾，从中渔利的阴谋。并力主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联合，共同抗日，挽救中华民族。杨虎城当即表示，愿在张学良将军领导下共赴国难。几天之后，杨虎城、杜承斌等约高崇民在三原东里堡杨虎城的别墅，与西北军方面的孙蔚如、赵寿山、申伯纯等上层人士会谈。后来，刘澜波、卢广绩、车向忱、栗又文又到了西安，他们共同与东北军、西北军上层人士研究联合抗日事宜。

1936年4月，高崇民亲自参加了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的密谈，双方取得了一致意见。这一时期，高崇民一方面奔走于东北军、西北军上、中层人士之间，鼓动联共抗日；一方面与栗又文、孙达生合编秘密刊物《活路》，宣传东北军只有抗日才有前途，揭露蒋介石卖国罪行。《活路》印刷得到了张、杨两将军的支持，但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并发出了通缉高崇民的通令。为了高崇民的安全，张学良秘令在洛川的王以哲、刘多荃将高崇民送到天津租界地。高崇民同志在天津向中央军委特科南汉宸同志汇报了在西北工作的情况。1936年10月，高崇民又秘密来到西安，住在杨虎城的军需处长王维之家中。张学良和杨虎城常来此会晤高崇民，研究抗日大政方针。高崇民亲自动笔，修改了张学良组织的《抗日同志会》章程。

1936年12月11日夜，张学良将高崇民接到西安，同来的还有

洪钊、卢广绩和黎天才。高崇民为张学良讲述了春秋战国时楚国发生的一个故事，张学良深受启发，决定实行兵谏。12月12日，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发生了。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让高崇民和申伯纯组织设计委员会，高崇民任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西安事变”中，高崇民极力赞同逼蒋抗日的主张，并且反对张学良赴南京送蒋，但未被张学良采纳，成了千古遗憾。

“西安事变”期间，高崇民见到了他十分敬仰的周恩来、叶剑英同志。高崇民始终没有忘记张学良将军。1946年7月，高崇民在东北解放区召开的各省市代表联席会议上，起草了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通电。1946年12月，延安各界纪念西安事变十周年，高崇民与关梦觉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纪念双十二、斥蒋介石背信弃义，要求释放张杨两将军》的文章。

1949年，高崇民得知杨虎城将军被害，满含悲愤，赋诗痛悼：“曾从杜老识尊颜，记忆犹新俱往焉。革命成功需代价，将军碧血照人寰。”

在1961年、1964年和1966年纪念“西安事变”期间，高崇民都做诗赋感，切盼张学良将军早返故乡，切盼祖国早日统一。

高崇民同志热爱家乡，关心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64年，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开原，考察和研究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高崇民被林彪、“四人帮”以莫须有的“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大假案所迫害，于1968年10月被关押，1971年不幸逝世，享年80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高崇民的冤案彻底平反昭雪，党中央在北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朱 承 泽

朱承泽，又名朱光沐、朱祖明，字大光，西丰县人，1911年12月7日生。1919年春入区立两等小学读书。1925年2月考入西丰县立初级中学。“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声援上海工人阶级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西丰中学的师生参加罢课游行。游行中，朱承泽积极散发传单并进行讲演。当时，中学校长贪污公款，吸食鸦片，对师生实行家长专制，引起师生的反对，朱承泽与师生一道同校长进行公开斗争，最后驱逐了校长。为了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朱承泽和同学们亲自动手制做肥皂、雪花膏等日用品，印制格本，装订练习簿，糊信封，做信纸等文具用品，并到各校出售，穿家做的土布衣服和布鞋，以此抵制日货。

1927年底，朱承泽中学毕业后到区立两等小学校担任教师。当时，青年学生运动在东北日渐兴起，朱承泽求知心切，决定弃教到省城求学。1929年2月，考入东北大学。同年夏，参加了由阎宝航、张希尧等人发起组织的“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在东北大学组织大学生讲演队，到茶馆、剧院、学校、福音堂等地演讲，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放暑假时，他和同学们一道不坐日本帝国主义强占的“南满铁路”（长春至大连）火车，从沈阳徒步回家，以示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按照“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的部署，朱承泽利用假期在家乡双河镇（今振兴镇）两等小学校主办平民夜校，亲自教当地农民识字，宣传抵制日货的意义，并把带回来的彩色标语传单张贴出来，教育人民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又参与了王牺忱、张希尧等人在县城集资开办的国货消费合作社。除动员群众集资外，还让其弟朱承学在国货

消费合作社当了一个多月的义务售货员。

1931年7月，朱承泽从沈阳带回一些油印的抗议日本军警制造的“万宝山事件”的宣传标语，让其弟朱承学张贴在大街上，以唤起人民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觉悟。同年秋，他读完学校规定的课程，并于毕业前随校考察团去上海、杭州等地考察。“九·一八”事变后，随东北大学的学生流亡到北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加入了“东北民众抗日救亡会”。千方百计地搜集马列著作和从南方传来的《萌芽》、《北斗》等进步刊物，秘密阅读，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一次，他和孙达生等人去看望刚从东北化装逃亡到北平的杜重远。当谈论到如何唤起民众抗日救亡时，杜重远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咱们应该去南方作国难讲演，唤起全国民众抗日。朱承泽听后很高兴，决定去南方作国难讲演。他们商定，由杜重远负责在上层人士中联系，朱承泽等三人负责在工、农、兵、商和学生中活动。同年11月初，朱承泽等国难讲演人员从天津港搭乘英国货船“通州”号到达上海。朱承泽在东北大学毕业前随校考察团来上海时曾与日本研究社的陈彬如、商务印书馆的黄警顽、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等上海知名人士有过接触。这次来上海，受到了他们的热情接待。朱承泽等人住在日本研究社，由陈彬如等安排一些工厂、学校和团体听讲。讲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特别是在上海工商界救国联合会礼堂连续三次讲演，听众颇多。除讲演外，朱承泽等国难讲演人员还参加了当地群众组织的抗日示威游行。各地纷纷来信邀请“国难讲演团”前去讲演。上海工商界救国联合会负责人对此表示赞助，他们用马相柏、蔡元培签名印发的100多份公函介绍朱承泽等人去长江沿岸各大城市机关学校讲演。

1932年1月下旬，朱承泽和孙达生的“工人讲演团”免费搭乘招商局在长江航行的轮船，从上海出发，沿长江逆流而上。第